

新加坡地铁站名华语译名社会语言学分析

何卓霖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610；

摘要：地铁站名作为城市或国家重要的语言景观要素之一，并非单纯的地理标识，而是蕴含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社会变迁以及居民情感等多维度信息。本文旨在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新加坡地铁（MRT）六条线路 145 个站点名称的华语译名进行研究，探讨它们的语言特征、命名原则以及文化内涵，以揭示新加坡地铁站名在命名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关键词：新加坡；地铁站名；华语；译名；社会语言学；语言景观

DOI：10.64216/3080-1516.25.12.068

语言是文化的关键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地铁站名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它们不仅体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社会变迁以及居民的情感，还是城市文化传播和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因此，从语言景观的角度审视，对地铁站名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所揭示的地区社会心理和文化概貌。

新加坡总人口约 592 万（2023 年），公民和永久居

民 407 万。华人占 74% 左右，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行政用语。华语作为官方语言也常作为其中一种语码出现在官方场合中。新加坡地铁 MTR 车厢内报站的电子屏共显示三种语码，马来语或英语在上，华语和泰米尔语并列在下。站名的华语译名（以下简称华语站名）有音译、意译和半音译半意译三种类型，其中还包含了部分新加坡华语词汇。



图 1 新加坡地铁 MTR 车厢内报站的电子屏

1 华语站名的语言特征

地铁站名称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形式具备特定的语言属性。现代汉语的标准地名命名有“专名定位、通名定类”这一说法。通名反映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分类，体现行政管理区域的划分体系；专名与对特定地区的初步认识理解相关。下面对新加坡地铁华语站名从音节和用字两方面特征进行语言学分析。

1.1 音节特点

新加坡地铁共 145 座车站的华语站名音节数统计分

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在华语站名的音节构成中，音节数量从双音节至五音节不等。统计数据显示，三音节站名占据主导地位，占比 44.82%。双音节站名和四音节站名分别占 28.28% 和 21.38%；五音节站名的数量最少，仅占 5.52%。三音节的站名占比最高，体现了华语站名的简洁化特征，便于人们识记，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华语不是站名标牌的优先语码，字体和占位都比马来语语码和英语语码小，因而华语站名更要短小精悍，便于显示。

表 1 新加坡地铁站名华语译名的音节概况

音节数	数量	百分比 (%)	举例
二	41	28.28	湖畔, 加冷, 碧山, 乌美, 博览
三	65	44.82	巴西立, 裕廊东, 欧南园, 牛车水, 陈嘉庚
四	31	21.38	丹那美拉, 大士连路, 芽笼峇鲁, 虎豹别墅
五	8	5.52	波那维斯达, 滨海南码头, 直落布兰雅
总计	145	100	

1.2 用字特点

作为新加坡华人群体的通用语言, 华语在这个国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在语言的各个层面, 它与中国普通话极为相近, 两者大同小异。尽管如此, 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将“新加坡华语”视为一个独立的变体, 因为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上相较于普通话展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朱德熙(1988: 128)将新加坡华语、中国台湾国语和中国香港中文视为汉语标准语在海外的变体样本。从华语站名也可以看出, 其命名习惯与中国地铁站的命名方式存在差异, 如“牛车水”“直落亚逸”和“武吉班让”等, 尽管每个汉字都认识, 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 理解其意义却变得相当困难, 这也是新加坡华语的语言特点。

华语站名共包含 236 个不同的字符, 字符“巴”的出现次数最多, 有 10 次, “大”和“园”次之, 分别是 9 次和 8 次。图 2 是出现次数达 5 次以上的字符数据统计, “滨”“海”“港”“湾”的多次出现体现其岛国特色, “园”“兰”“美”印证了其“花园城市”的

美誉, “士”“拉”“洛”“尼”都是汉语音译中常用的汉字, 多为人名的音译字。

字符	出现次数	频率%	西	6	1.3605
巴	10	2.2676	达	5	1.1338
大	9	2.0408	道	5	1.1338
园	8	1.8141	东	5	1.1338
滨	7	1.5873	港	5	1.1338
海	7	1.5873	吉	5	1.1338
兰	7	1.5873	加	5	1.1338
美	7	1.5873	洛	5	1.1338
士	7	1.5873	尼	5	1.1338
拉	6	1.3605	湾	5	1.1338
勿	6	1.3605	武	5	1.1338

图 2 华语站名字频统计数据表(出现次数 5 次以上)

2 华语站名命名方式

新加坡地铁的华语站名命名主要是由马来语和英语翻译而来, 采用了 3 种翻译方法: 音译、意译和半音译半意译。根据统计数据, 华语译名主要采用音译法, 共有 82 个, 占总数的 56.55%, 半音译半意译有 37 个(25.52%), 意译只有 26 个(17.93%)。华语译名翻译方式情况见表 2。

表 2 华语译名翻译方式统计表

翻译方法	实例	数量/个	占比/%
音译	劳明达(Lavender) 宏茂桥(Ang Mo Kio) 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	82	56.55
意译	政府大厦(City Hall) 牛车水(Chinatown)	26	17.93
半音译半意译	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 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	37	25.52

马来语和英语是地铁站名标牌的优先语码, 即便部分站名的叫法源自汉语, 也会用英文的拼法表示, 如宏茂桥(Ang Mo Kio), 源自福建话的音译, Ang Mo 即“红毛”, 指的是外国人、老外, Kio 即桥; 如四美(Simei)用汉语拼音拼写, 即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意译后的站名一般意义明了, 如政府大厦, 但有部分站名使用意译的方法翻译后, 依然是“看不懂的中文”, 如牛车水。牛车水指的是新加坡唐人街, 由来是当时没有自来水, 牛车运水的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 这成为了新加坡的华语词汇。

华语站名命名遵循指位性原则, 旨在明确指示特定

区域范围, 并选取认可度较高的地名。通过对新加坡地铁华语站名的分析与整理, 其命名方式主要分为以下 4 大类:

2.1 以区片名命名

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 无省市之分, 全国一共划分为五个社区, 分别是东北区、东南区、西北区、西南区和中区, 大小不一。地铁站名以区片命名的地铁站数量最多, 占比约 45%, 如实龙岗、金文泰和女皇镇等。在区片名中, 有的以植物命名, 如淡滨尼(Tampines)名字来源于一种树“Tempinis Tree”, 曾种植在这个片区; 有的以人名命名, 如麦波申(MacPherson), 来

源于英国人 Ronald MacPherson 上校，他是海峡殖民地第一任殖民大臣。以区片命名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便于公众识记。

2.2 以标志性建筑、景点命名

地铁站名在展示城市形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大厦、体育场、植物园都是一个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和景点。在以标志性建筑、景点命名的地铁站中，以“园”结尾的站名最多，如欧南园、裕华园、花拉公园等，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美名享誉全球。

新加坡标志性的建筑和景点，不少是为了纪念某些特殊的人物而建立的。例如虎豹别墅，又称万金油花园，这是由出生于缅甸的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建造的私人别墅，以其父创办的虎标万金油药膏命名。又如陈嘉庚站，是新加坡华侨中学门前的地铁站，华侨中学由陈嘉庚资助倡办，体现了对海外华侨敬意，彰显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宽容和谐。以标志性建筑、景点命名，利于弘扬新加坡城市文化。

2.3 以街、道、路命名

以道路名称命名的依据是与该站点所在线路的主要交通干线，这类站名数量仅次于区片命名的车站，如大士西路、第六道、尼诰大道、劳明达等。道路的命名反映了新加坡人对花卉植物的热爱，例如，劳明达街曾是众多使用排泄物作为肥料的菜园，气味难闻，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市政府决定以芬芳的“薰衣草”来命名这条街道。

地铁站的命名与道路名称保持一致是为了便于人们将道路名称与地铁站名称联系起来记忆，既减轻了记忆负担，又加深了人们对城市规划的印象。这种命名方式还有助于增强城市的整体感和连贯性，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4 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

岛国新加坡被海洋包围，因此部分站名与海洋有关，如滨海南码头、榜鹅海岸、海湾舫、直落亚逸（海湾）等，还有一些以山、河等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命名，如武吉甘柏和加基武吉，武吉对应马来语 Bukit，是“山”的意思，又如卡迪和梧槽，都以当地的河流名称命名，体现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特征。

3 华语站名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心理

地铁站名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景观，承载着基本的导向功能，且与当地的文化和心理紧密相连，成为

映射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

3.1 华语站名彰显新加坡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文化融合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的特色，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一定影响。

新加坡地铁的站名标识采用了多语言导向的公共标识系统。在这些公共标识中，双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加坡政府的实用主义倾向。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信息能够直接、有效地传达给各个目标语言群体。同时，公共标识中出现的三语、四语等多语言标识，进一步反映了新加坡政府严格执行其语言政策，尊重多种族、多语言的文化。

地铁站名的官方叫法，即站名标牌上的优先语码部分，同样彰显了新加坡语言多样性的特色。如纽顿（Newton）用的是英语，武吉甘柏（Bukit Gombak）是马来语，多美歌（Dhoby Ghaut）来自印度语发音，义顺（Yishun）是汉语拼音，蔡厝港（Choa Chu Kang）是汉语方言潮州话，波那维斯达（Buona Vista）是意大利语。此外，还有混合使用两种语言的站名，如罗弄泉（Lorong Chuan）和大巴窰（Toa Payoh）都结合了马来语和汉语方言福建话，Lorong 是马来语“巷子”的意思，Chuan 为福建话的“喷泉”，Toa 是福建话的“大”，Payoh 在马来语中则指“沼泽”，19 世纪的大巴窰多为沼泽地。单是地名叫法就体现了多种语言的融合，这不仅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背景，也展示了不同族群在新加坡历史发展中的交融。

3.2 华语站名反映历史文化

新加坡的近代历史始于 1819 年 1 月 29 日，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代（Stamford Raffles）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在新加坡建立了贸易站。1824 年新加坡的英属时期开启。东西线与南北线交会的换乘站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便是为了纪念这位海港城市的奠基人而命名的。南北线的布莱德（Braddell）则纪念了这一时期的海峡殖民地检察官托马斯·布莱德（Thomas Braddell），他起草了当时新加坡的法律体系，重塑了地方法院程序。

自 1942 年 12 月起，新加坡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直至 1945 年日本正式投降，这一时期被记录为日侵时期。新加坡因其华人人口众多，成为了南洋华侨抗日运动的中心。在那个时期，著名华侨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了东南亚地区的 800 万华

人同胞，筹集了相当巨额外汇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竭力倡办华文学校，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华侨子弟。在他的推动下，华文教育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发展。著名华侨周文礼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多条道路、学校、住宅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林文庆也是一位成功的华侨商人，在新加坡大有名气。为纪念这些杰出的华侨华人，地铁站陈嘉庚（Tan Kah Kee）、文礼（Boon Lay）、文庆（Boon Keng）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3.3 华语站名反映社会心理

地铁站名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反映了人们对某个地方的情感寄托和认同感。华语站名反映了新加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站名广泛采用了富含美好寓意的汉字，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多美歌（Dhoby Ghaut）源于印度语，意为洗衣工人的台阶，纪念印度劳工对新加坡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华语译名使用“多、美、歌”三个带有积极含义的汉字作为音译，带给乘客愉悦的心理感受。百胜（Bras Basah）源于马来语，意为潮湿的白米，让人联想到早期的生活场景和农业活动，华语译名巧妙地音译成“百胜”，犹言百战百胜。这些站名都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

华语站名反映了新加坡人民对自然环境的爱护。新加坡正力图转型为生态友好型国家，华语站名蕴含着环保意识。例如以公园命名的站名，花拉公园（Farrer Park）和拉柏多公园（Labrador Park）、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和山景（Hillview）等都体现了人们对绿色生态空间的珍视与爱护。

华语站名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期望。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在经济、科技、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地铁站名映射了新加坡人民对科技与社会进步的期望。纬壹（One-north）是女皇镇里的一个区，集中了新加坡的创新科技产业与高等教育机构，其命名源于新加坡位于赤道北纬1°，同时巧妙地将“One”与“north”结合，寓意着这里是新加坡科技创新的“北极星”。滨海中心（Esplanade）则是新加坡文化艺术繁荣的象征，这座现代化的艺术中心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站名展示了新加坡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新加坡地铁站名不止是地理位置的指引，更是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社会心理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的产物。

4 结语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选取了新加坡地铁（MTR）2024年8月前开通运营的6条地铁线路共计145个车站的华语站名，从语言特征、命名方式和文化特征与社会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在语言特征上，华语站名命名简洁，以三音节站名居多，便于人们识记，其用字体现出本国的地理特征及历史文化。在命名方式上，华语站名主要以区片、标志性建筑和景点、道路名称和自然地理实体为命名依据，展现出显著的指位性特征。华语站名不仅传递着地理位置信息，还映射出新加坡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是研究新加坡文化以及新加坡华语的宝贵语言材料，具有重要的语言学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崔峰，谢佩君. 政府决策对街道地名翻译的影响——以“竹脚”的译名变迁为例[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1）.
- [2] 李如龙. 汉语地名学论稿[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3] 林雨欣，崔峰. 国家认同视角下的新加坡街路译名研究[J]. 上海翻译，2017（1）.
- [4] 王越. 广州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 名作欣赏，2021（17）.
- [5] 杨燕美. 深圳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J]. 今古文创，2021（27）.
- [6] 张晖. 新加坡中国城地区语言景观研究——以宝塔街为例[J]. 陇东学院学报，2018，29（4）.
- [7] 周定国. “狮城”新加坡地名文化[J]. 中国测绘，2008（6）.
- [8] 朱德熙.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 [9] 祝晓宏. 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10] 祝晓宏. 语言景观视角下的新加坡华语生态规划[J]. 中国语言战略，2022，9（1）.

作者简介：何卓霖（2001—），女，汉族，广东佛山，硕士研究生，暨南大学，研究方向：海外华语、华文教学。